

编辑家茅盾临终缄默无言。这就要求——

导言 为茅公再捧上一束“勿忘我”

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

——巴金：《悼念茅盾同志》

—

清晰地记得那个早春三月的清晨，我正在湘中一所大学的操场上跑步，广播中传来茅盾谢世的新闻，我猛然感到：一个奋斗的使者最终走向了归宿。我不由自主地离开循环奔跑的人流，独自在操场一角踱步，因为运动而躁动的青春热血，陡然感到很冷很冷。

那时，我还不到 19 岁，照理不应有这样的人生感悟。

那时，高音喇叭里没说殒落的是中国编辑史上的一颗巨星，我自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会反复咀嚼他的编辑实践活动，品味他作为文学编辑家的人生。

可能就从这最初的、惟一的、一厢情愿式的感情交往中，笔者建立了写作的自信。

上苍说，这是禅是命是冥冥之中非理性的安排；也有人说，不是都不是。这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选择，就如同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便归隐、升天，时代需要他了，自然也有人请他复活、再生。

二

茅盾和沈雁冰是一个人，他集政治家、作家、编辑家于一身。

文学家茅盾是他的上身。这是为社会和世人最注目的。站着，他是个作家；倒下，他是一堵不易超越的文学史城墙。他从中式长衫里一忽儿掏出一本划破夜幕的《子夜》，一忽儿耍魔术似地变出红于二月花的“霜叶”。他似乎取之不尽，读者也百读不厌。直到他最后亮相时，才知他的便便大腹里是多达千万余字⁴⁰卷的《茅盾全集》。

编辑家是茅盾和沈雁冰的双腿。正如身躯之上是头脑，双腿支撑了一切，编辑工作与实践是茅盾的生命依托。借此，政治家的沈雁冰获得了立足之地；文学家的茅盾谋求了个人文化生命的拓展。他迈进社会的第一入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基地商务印书馆。在那里他求索了¹⁰个春秋。他最早取得世人瞩目的业绩是改革并主编《小说月报》，此后再没有断过那条鲜艳醒目的生命线。编辑工作于茅盾，恩恩怨怨。

临终时候，政治家的沈雁冰不忘向党中央写封信申请追认为中共党员；文学家的茅盾不忘拿出²⁵万元人民币设立“茅盾文学奖”；编辑家的茅盾缄默无言，睁着眼睛睡着了。是无意识的忘却遗漏，还是有意地忽略不记？是洞彻生前死后，最后一次雕塑默默无闻的编辑家形象，还是饱经风霜大智若愚留下跨世纪的禅语？后代

学者颇费猜疑。

三

自树无字碑，智举。编辑家应该如此？编辑家只能如此？

胡耀邦在沈雁冰同志追悼会上致词，虽然提及“他接办和改革了《小说月报》”；亲自主编了《文艺阵地》等编辑活动，但盖棺定论的是：“沈雁冰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以胡耀邦当时的身份，这人生定位当然也是难得的殊荣。

历史地看，政治家的‘近视眼’有时会造成学术研究的空白与盲点。茅盾的研究者在热烈拥抱文学家茅盾时，把编辑家的茅盾冷落一旁了。研究文学家茅盾的著作已经很多，遍及其文学生涯的方方面面，而研究编辑家茅盾的文章却寥寥无几，正如从前和当今的世界，了解、理解小说家、文学批评家茅盾的很多很多，而知晓编辑家、出版评论家茅盾的要少得多，少得可怜。即使面对《小说月报》、《文学》、《中国的一日》这样中国现代编辑史上的杰构，茅盾研究者们也只是赞叹几声后，或不愿、或不屑、或不能加以细致研究。

茅盾曾企盼过有编辑学吗？是的，他 30 年代就说过，后人研究当时的期刊可得博士学位。

在编辑学研究初步觉醒的本世纪八九十年代，茅盾研究者依然把他自觉而卓有成效的编辑实践淡化，杂糅在创作、文化活动中，本体与视角的错位未免不加深了他孤独的先行者的心灵阴影。

编辑家茅盾的双眼并没有闭上。‘那高尚卓越的亡灵虽早已升入天堂，但并未安息，依然频频俯瞰尘世，依然在寻觅理解、追求认同，祈望编辑科学与编辑家人生的正确定位。正如他关心着是否出

现了专门研究期刊的博士，整整 60 年，他都在期盼。

给他献上一束鲜花以表白高山仰止的敬慕之情，一直是我的心愿。他的编辑思想系统、丰富、深刻，编辑实践卓有建树，编辑家的整体形象比其他文化大家更光彩夺目。

挑选一束什么花使我颇费心思、犹豫再三。正如我写这本书，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但写得很少，思考时热情奔放，但写起来很冷静；探究得近乎艰涩，表达却想追求平易。

更让我驻足犹豫的是，茅盾曾掷地有声地说：“我是经历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评传的写作固然与小说创作不同，但这话确乎启发我反躬自问，甚至映衬了我的浅薄与无知。虽然选择茅盾编辑家的侧面为文作传，而我到底积累了多少编辑体验与经验？写传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什么？又能说明什么？是只系于写作过程本身，以求与先哲对话交流，以求自我情绪的宣泄、内在思考的物质外化？

早在 1929 年，茅盾就告诫人们：“知道信赖着将来的人，是有福的，是应该被赞美的。但是慎勿以‘历史的必然’当作自身幸福的预约券，且又将这预约券无限制地发卖。”堪称人生箴言。我却近乎明知故犯。我凑合着挤出一本编辑学著作，忙于赚钱致富的国人难免以为多余。所以如此，无非自信茅盾研究者、编辑学界对这无所事事别无所求中抢先垫上的铺路石不会视如累赘。即使不是我，在这个时刻，来从事这种不识时务、不合潮流的工作，在将来，总有人会悉心挖掘、全面整理、深度解剖茅盾的编辑理论与实践，总有人类似地撰著编辑家茅盾评传。

对静穆、深沉的茅公，或许更应该敬献一束郁金香；浓墨重彩，自有风格，但我还是为编辑家的茅盾挑选呈送了一束“勿忘我”，清淡素雅，蛮有情调与意味。

第一编

报刊编辑

为老板干活，年年加薪，第二职业稿费收入接近工资。要问其中诀窍，不妨领会——

第一章 叩响商务大门的沈德鸿禅语

雁冰兄是自学成功的人。他在商务印书馆任事，编译工作不只是他的职业，是他磨练自己的课程，在主办《小说月报》以前，已经有些著译问世了。

——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人生就是故事，大故事套中故事，中故事又含小故事。有的人会处世，交好运，所以总会编故事，总有好故事。有的人活该倒霉，好故事变成坏故事，大故事变成小故事，有故事变成没故事。

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编、都造、都说、都讲大大小小好好坏坏一连串的故事。

文学编辑家的传记就是一大堆编辑部的故事。

小编辑家也有大故事。编辑家不显眼，小编辑家更为人们不足道。他的故事往往有目无辞至于湮灭。大故事便大事化小，无人称道，无人知晓。可叹可惜。

大编辑家也有小故事。因为他是故事大家，是大家的故事，小故事也有人寻根究底，道听途说，添枝加叶，最后成为大故事。可喜

可悲。

写编辑家茅盾的传记，可以不讲他以钟英小姐的化名代共产党的第一届总书记收转函件的故事，可以不讲他受党安排去南昌起义的故事，可以不讲他 40 年代在新疆智斗盛世才好不容易全家脱离虎口的故事，可以不讲他途经延安讲学、写作的故事，但不能不讲这样一个小故事：

1916 年 7 月。北京。酷暑蒸人。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伯恒频繁造访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卢学溥，希望承印政府所发行的大量公债票。北京分馆拥有京华印书局，设备和技术是能保证所印公债票合乎规格的。孙还是费尽心思巴结，那可是一笔利润可观的大买卖。卢司长正有一个表侄（即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表嫂（即沈母）陈爱珠已另外来信说，最好不要让儿子在官场和银行界工作。两条故事线索交叉碰撞，造成了这样的结局：沈德鸿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最后成长为赫赫有名的作家、编辑家茅盾，而北京分馆得到了公债票的印制业务。

太偶然。历史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五彩斑斓的命运往往擦肩而过。如果不是沈母的信，如果卢司长决计要把表侄拉入政界、银行界，作为自己的门徒、接班人或同党，沈雁冰的人生传记就会有另外的文本与结构。偏偏母亲的一封信葬送了他金融大亨的财运或高高在上的官运。

有编辑家茅盾的人生传记可写，连笔者也真不知应当感谢谁。是卢司长？是沈母？还是个人经历与包围的某些人和事？对比后人探讨编辑学问，追溯他历史足迹的郑重其事，少年沈德鸿迈出编辑生涯的第一步太漫不经心，甚至于懵懵懂懂。认真的书生咀嚼出其中的反讽韵味是自我虐待。传主不会有意提前捉弄后世作者吧？沉稳、睿智的长者也无法对穿开裆裤时的童稚、顽皮负责。

1916 年 8 月下旬，沈德鸿只身从浙江桐乡来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便直奔位于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诚然只是一个商业性的出版机构，但一个青年学生要见其总经理，并不比当今叩开中央某部长的办公室容易多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翰林出身，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但他的办公室却是为传达室、茶房重重包围，至少要破两三道岗的。

沈德鸿刚想上楼，便被人盘问、阻拦，听说“请见张总经理”，更是遭到白眼，令其静静等候。不知是急切盼见主人，还是一时性急，沈德鸿反弹出：“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孙伯恒”三字镇住了对方。当那人面带笑容询问是否北京分馆孙经理，沈德鸿只从口袋中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在那人眼前一晃，得到的答复是：“请，三楼另有人招呼。”

沈德鸿便慢慢走上三楼，他没有回答传达的笑容，也没有对视目送他的眼光，但回头一看，传达的对面果然坐着两位等待传呼的客人。

三楼门口的来客登记更是近乎谏语。一到三楼，便有人请他登记。在登记人与来客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沈德鸿”。

“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

“是道德的德”。

“三点水共字的洪罢。”

“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

登记人不解，摇头。

“是翩若惊鸿的鸿。”

登记人更是睁大了眼睛。

最后是旁边的客人点破：“是江鸟鸿”。

领悟之后,登记人皱着眉头埋怨:“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也得登记。”

青年沈德鸿当然无意于此卖弄学问,脱口而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翩若惊鸿”,不过是日诵夜习,烂熟于心而已。鸿类词中有鸿福、鸿运、鸿沟、鸿儒、鸿雁等,沈德鸿都无意识中忘却了,他激动之中瞬时记忆的是“鸿鹄之志”;“翩若惊鸿”。当然,当有人把他的名字与“洪水”联系一处时,他还本能地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策应。沈德鸿那“翩若惊鸿”的人生理想是不被人理解的,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奋斗与困惑也难以得到深层的文化共鸣,常人理解的是平常之物“江鸟”。而江鸟大概是沈德鸿不屑一顾的形象;“江鸟”可以破译、解读“鸿”,是让聪慧的沈德鸿颇感困惑的吧?

无人策划,无人导演。一心求职的沈德鸿也不一定着意扮演,但那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一、批评《辞源》,编译《衣》、《食》、《住》的因果链

沈德鸿是能为商务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附加税”,张总经理当然不敢怠慢。他安排自己的专用小汽车,安排茶房头头接、送他去编译所,以至全所上下都窃窃议论,以为沈是张的亲戚。因为据说自有编译所以来,从没听说一个新来编辑是坐了总经理的专用汽车并由茶房头脑伴送来的。

沈德鸿的礼遇也仅只汽车接送而已。安排他去英文部,并没特别的考虑。那里新成立的“英文函授学校”正缺人,自然是有英文基础的新职员补缺。沈的工作是修改学员们寄来的课卷。工作很轻松,一天只改四五本卷子,而且学生英文程度不一,最高的也相当于中学二年级。改卷是机械劳动的简单重复,沈德鸿却也并不

讨厌,相反很喜欢英文部里开口必说英语的‘怪’现象,可以浸润其中借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口语能力。所学与所用并不完全对口,但并不抱怨怀才不遇,工作枯燥,却能从另一方面咀嚼出滋味,进而查自我知识之漏、补自我能力之缺,足见其少年聪慧。

一个多月后,沈德鸿一封寥寥 200 字的短信引起了他工作部别与工作性质的转换。他从同宿舍的同事处看到了当时商务版发行的《辞源》,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信。茅盾晚年回忆说:

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次举《辞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说,《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①

显然,这封书信的基本内容是出版评论。以《辞源》为核心,有从宏观的图书市场着眼的肯定,有从读者阅读、使用角度的指瑕,更提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出版对策。原件不存,难窥全貌,但视为茅盾出版评论的第一声啼鸣,不为过誉。

沈德鸿写此信,纯系一时冲动,事前事后都未与人言及。写就

^①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第 18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寥寥 200 余字，随意地交给茶房，连同编译所每日送请总经理过目或核示的诸文件送去。

当晚，寝室的同事悄悄告诉他：“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沈后悔没炫才自荐，不然，信可以引经据典，写一二千字。

如果不是这一封信，所长高梦旦甚至还不知道编译所里有沈德鸿这样一个人才。在翰林出身而又曾一度问鼎政治的张元济看来，沈德鸿无非是缔结社会关系网的一个工具，安排沈德鸿的工作无非是出版经营的一种手段。编译所里高薪豢养了一批有后台的特别人物，经常不上班，即使上班也不编不译。沈德鸿不在此列，但张未必不是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他的，所以，安排工作时，张元济总经理竟然越过编译所长直接与英文部部长邝富灼联系。邝也没领沈去见所长。

如果沈德鸿只有担任司长的表叔作后台，没有真才实学作为自己的人生资本，他诚然也能进商务，但写不出让上司刮目相看的信，不会让总经理、所长重新认识其价值。不论自觉还是无意，不论就内容还是形式，沈德鸿批评《辞源》都是聪慧之举。

次日上午，高梦旦约见沈德鸿，开门见山地说：

“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才，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

沈并不认识孙毓修，更不了解他。他猜想孙老先生大概懂英文，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沈德鸿也不多问，只说：“我愿意。但须先向邝部长说明，向他告别。”高梦旦才想起说：“我同你去，邝博士还不知道要调你呢！”

孙毓修是前清末年就在商务编译所里任职的高级编译，对版本目录学颇有研究，但英文程度并不高，主要工作是为编译所的图

书馆涵芬楼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有空余时间，才译点书。他把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译了三四章，就没有再译。高梦旦说的合作译书，即指此。

孙毓修把他译的前三章交给沈德鸿。说他的译笔与众不同，不知道沈以为如何？沈德鸿把译文看了一下，原来孙说的“与众不同”是译文的骈体色彩很显著；对照英文原文抽阅几段，知道他采用的是“意译”，离忠于原著的“信”相差太远。但沈德鸿并没有急于表白己见。细想一会儿后，他才说：“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得老先生决定。”孙毓修也自负地笑道：“试译一章看吧。”

一个溢于言表，一个含而不露。一个是年约 50 的名士，一个是年仅 20 的毛头小伙。

合作译书是愉快而顺利的。沈德鸿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三章原稿，反复揣摩他的意译方法，并摹仿其风格，以三四天的时间便译出了一章。当沈把译稿交给孙时，孙老先生说：

“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

意味深长。看完原稿后，他改口笑着说：“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

沈德鸿依然不紧不慢地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

孙老先生点了点头。可是执笔沉吟半晌，只改了两三处几个字，便把原稿退还沈，并让他继续译下去。

懂得迁就，意味着少年老成。这也是一种处世艺术。而颇费心思后，迁就成功，则意味着知识和才干都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沈德鸿既重视骈文的语言形式，同时自信对原著的忠实理解。所以他及时提醒孙毓修说：“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孙老先生摇头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校对原作，只要

中文好,就付印。”

沈德鸿大吃一惊,明珠暗弃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后来他才知道,所中并不缺可做这项校勘工作之人,但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指出译笔有误,难免会得罪人的。

一个半月以后,全书译完。孙老先生匆匆读了一遍后,很得意地肯定:“我看可以。”征得所长高梦旦同意后将发排付印。关于版权页,孙老先生问沈德鸿:“用你我合译或是你译我校,何者合式”。沈猜想他还是比较喜欢用“沈德鸿译,孙毓修校”的,但他很干脆地对孙说:“只用人一人的名字就好!”孙没想到沈不想在版权页上露面,又惊又喜,回答道:“好,就这样办。”

据说,当此书以《衣》、《食》、《住》之名初版时,只署孙毓修编译,重新再版时才补署上沈雁冰的名字。但那是 1922 年孙毓修去世以后的事了。

接着,沈德鸿又一鼓作气译完了《人如何得食》、《人如何得住》。到年底,进商务编译所恰满 5 个月。会计送来薪水,并附一通知,自下年正月起,每月薪水 30 元,即每月加 6 元。这是令沈惊喜的。刚入编译所时,他很要好的同事告诉他,24 元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照惯例,工作一二年后,可以加薪,5 元一度,如此递加,最高可达 60 元。当然那时要熬上 10 多年。虽是破格优待,孙毓修依然愤愤不平,说,5 个月译了两本半书,人家一年译一本书,月薪六七十元,他们欺侮你年纪小,我去为你说说。沈德鸿制止,当然他也知道,孙不一定真去说,不过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沈还坦然表白:“我没有家庭负担,在此不为名不为利,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以读点书而已。”淡泊明志,恬然待之。

1918 年,沈德鸿每月增薪 10 元。

1919 年,沈德鸿每月又加薪 10 元,月薪达 50 元。1921 年,沈主编《小说月报》,月薪百元。

在一个近代化的出版企业中,工薪当然无法与他创造的劳动价值等同,但工薪逐年上升的曲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职员的增长和商务管理阶层对沈德鸿编创劳动的价值评价。而沈同时向商务及其他报刊投稿的收入平均每月也有 40 元左右。当时商务的稿酬标准,最低每千字 2 元,最高 5 元,但那是极少数的几个特约撰稿人才能享受的。由此可推算沈每月的创作发稿量近两万字,堪称勤奋有加。至于这 90 元有多大的市场购买力,茅盾回忆说,他花 100 多元添置、装修了一间新房,还有人说是‘洞房’。

二、助编《学生杂志》,磨砺期刊编辑之剑

沈德鸿刚译完《衣》、《食》、《住》时,在国文部同时担任《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和《少年杂志》三个期刊编辑工作的朱元善,就对孙毓修说,想请沈译点小东西,丰富刊物稿源,为刊物增添起色。孙毓修碍于面子,不好拒绝。而沈德鸿呢,《衣》、《食》、《住》正陆续排版,陆续看校样,也有时间。

朱元善便向沈德鸿提出了他的编辑构想:《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学生是有兴趣看小说的,杂志上打算登一点。当然,学生最好看点科学小说,便要沈找有关材料翻译之。至于朱元善是惊异于沈德鸿 5 个月译两本半书的才华,还是有意挖人,为我所用,是一时难辨的。反正就因为朱元善有意识的期刊编辑策划,无意识地提醒了沈德鸿注意研读国外书刊。他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发现了两种杂志,一种叫《我的杂志》(My Magazine),一种叫《儿童百科全书》(Children's Encyclopaedia,这也是每月出版,像

杂志形式），两者都是面向中学生以历史、科学知识为主的通俗刊物。他从中找到一篇科学幻想小说，也就是1917年登在《学生杂志》正月号上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

1917年9月，朱元善向所长高梦旦提出，要沈当他的助手，助编《学生杂志》。孙毓修借口还要带沈德鸿编辑《中国寓言续编》，不肯放。结果，把沈平分，半天编《中国寓言续编》，半天帮助朱元善审阅《学生杂志》的来稿。《中国寓言续编》最终是流产了，但《学生杂志》却是沈德鸿成为中国现代期刊编辑大家的起跑线。

那年，沈德鸿21岁。21岁能担此任，实乃幸运。

相对于从师孙毓修助编《中国寓言》而言，这意味着拯救和希望。翻译《衣》、《食》、《住》，成绩固然出色，但沈德鸿的心灵从深层讲是压抑的。策划编纂《中国寓言》，固然是从沈德鸿自身学养出发的因材施教，且也因此而填补了图书市场的空白，彪炳史册。但沿路走下去，沈德鸿只会在故纸堆里倍感扭曲和扼抑，最多成为古文学方面的专门家。书香门第，堂堂学府能为编辑家的成长奠定最初的也最丰厚的基石，但编辑家的最后培养成型只能是具体、实在的编辑出版岗位。默默无闻的沈德鸿、名声大震的沈雁冰、赫赫有名的茅盾，代表了编辑家茅盾的三个时代，也是他编辑工作的三个阶段。但茅盾的成长不是孤立的，编辑家的茅盾尤甚。沈德鸿良好的个人禀赋决定了他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人。但是，正如他后来离开商务印书馆照样成为大作家，但没有商务印书馆的实际编辑工作锻炼，他却万万不可能成为编辑家。编辑学科自身内涵的实践性、编辑人才成长的特定规律性，都严正地提醒后来的研究者注意沈德鸿的同事、领导对他的影响，因为他正当涉世之初，正处于人生关键的一个可塑期。正是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朱元善是第一个实实在在地扶编辑家茅盾上战马的人。他只送一程，但意义深远。

可以说,没有助编《学生杂志》的沈德鸿,就没有助编而后主编《小说月报》的沈雁冰。如果没有改革《小说月报》成功的沈雁冰,编辑家茅盾的存在意义是难以想象的。

诚然,沈德鸿只是助编《学生杂志》。助编过程,对于勤奋、实干的沈德鸿来说,是主编朱元善的编辑策划、编辑操作的实施过程;而对于好学、聪颖的沈德鸿来说,是感受 and 了解如何策划期刊,如何酝酿编辑操作方案的学习过程,更何况,为了完成主编交给的编辑写作任务,沈德鸿以搜寻编撰材料,进而以学习编辑技术的双重眼光大剂量地研读了涵芬楼所藏的外国期刊。这阅读研习过程,从远处说,使沈雁冰提前寻找到了后来改革《小说月报》所需的摹本和范式,自觉不自觉地提前积累了后来当主编时所需的知识储备。从近处说,培养了沈德鸿的文学兴趣,使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学生杂志》不适合刊登的作品,他就投稿给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由于他常在《学灯》上露面,《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创办《解放与改造》时还向他约稿。日臻成熟的文笔,日益扩大的知名度也成为他后来成功地改革《小说月报》的文化和舆论基础。

朱元善一人主编三种商业性杂志,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本世纪初却是事实。同在商务的王蕴章也同时主编《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朱元善操作期刊的编辑方法和手段代表了本世纪初期刊编辑的历史水平。他编《教育杂志》,主要借鉴日本的教育杂志的编辑方法。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方法,从大学到中学,内容五花八门,共有十余种。朱元善本人并不懂日语,他只看日文中的汉字猜想内容,认为可用,便圈出来,请馆外人翻译。翻译者只得稿酬,不署名。他对教育学说也无研究,但他用自己的观点把译文加以改编,署名天民发表。因为杂志介绍了欧美新的教育学说和教育